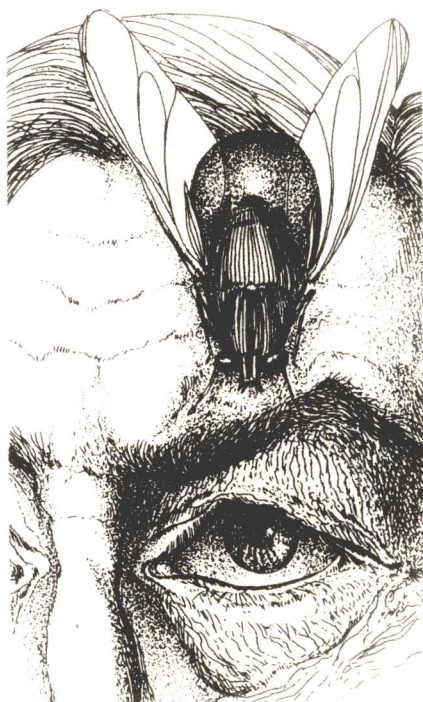




德国人会死绝？

Kopfgeburt

oder Die Deutschen sterben aus

Günter Grass

南京大学出版社

德国人会死绝？

Kopfgeburten

oder Die Deutschen sterben aus

Günter Grass

[德]君特·格拉斯 著 郭力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人会死绝? / (德)格拉斯(Grass, G.)著;郭力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305 - 09666 - 2

I. ① 德… II. ① 格… ② 郭… III. ① 随笔—作品—
德国—现代 IV. ① 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2612 号

Günter Grass

Kopfgeburten. oder Die Deutschen sterben aus

Copyright © Steidl Verlag, Göttingen, 1993 (first published in 198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NJUP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8-028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德国人会死绝?
著 者 (德)君特·格拉斯
译 者 郭 力
责任编辑 沈卫娟

照 排 江苏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5 字数 96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9666 - 2
定 价 2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 (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走在自行车车流间，骑车人不断从身边骑过，他们有同样的装束，同样的身态。这是一个大都市的自行车林子，密密麻麻犹如热带密林；这是上海，一个生活着一千一百万中国人的城市。异人流之间，我们脑际突然冒出一个设想：如果不久的将来，德国人成了九亿五千万，而中国人变成了近八千万，世界会如何？

不由自主地，我算了下去，这样的话，要为世界施展与生俱有的勤劳的德国人中，萨克森人会达到一亿，施瓦本人会达到一亿二千万。

这自行车车流令我们胆战。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吗？这样的假设会被允许吗？现在变成了九亿五千万的德国人，如果以他们每年 1.2% 的人口增长率增长，到 2000 年，德国人口会达到十二亿。如何想象这个世界的存在？如何指望这个世界的到来？这个世界应该抵制（可是怎么抵制）这个数字吗？或者，这个世界完全能容下这么多（包括萨克森人和施瓦本人在内的）德国人，就像能容下九亿五千万中国人一样？

这种假设理由充分吗？需创造什么条件来让德国人口这样吓人地增长，又需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这种增长呢？是不是得通过钢铁纪律，通过德国化进程，还得通过“模范母亲或者生命泉协会的精神”^①来实现？

为了不在这众多推测中迷失方向，我们这样安慰自己：如果我们将普鲁士老传统请回来，统治十亿德国人应该没有问题。就像在中国，尽管经历了种种革命，传统官僚体系仍在保障着他们对民众的管理。

至此，乌特和我必须马上回到现实，必须马上留意身旁的自行车车流。（我做得几乎不显鼻子显眼，但是若走在德国自行车车流中，这是无法避免的。终于，我们离开了车流，安然无恙，也离开了我们可能会冒犯的其他事情。）然而当我们访问了中国、新加坡、马尼拉、开罗，结束数月的亚洲之行，又回到慕尼黑、汉堡、柏林后，许多新设想又注入到我们的德国现实感中。这次的注入是反向的。

具体地说，德国人口的发展问题正引起德国人的争论。在野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指责政府阻碍了德国人口的正常增长。他们说，致使德国民族面临人口萎缩的原因，是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经济管理不善，政府工作不利，因而人口增长停滞，使联邦德国六千万人口的稳定只能靠外国人的加入来保障。他们认为这简直是耻辱，这样发展下去，如果不考虑外国人（外国人本来就该考虑，自

^① 这四项都为纳粹时期通用的政治方针。当时多子女的母亲被标榜为“模范母亲”，而生命泉协会是个纳粹协会，宣扬种族纯化。——译注（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注）

然而要被考虑)的加入,德国人口增长还会减慢,人口老龄化趋势更会加剧,以致不能不做出德国人会消失殆尽的推测。而同时人们清楚地知道,根据统计数据,中国人口在迅速递增,到2000年时,他们的人口将达到新高。

如果在联邦议会及公众舆论讨论德国人口减退问题的当口,偏巧有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来访,在野党很可能会惊恐万状。德国人恐惧感的增长速度总是不慢,比中国人口增长得还快,因为会制造恐惧的政治家们将此项工作列入了他们的日程安排。

德国人会死绝。世界上会出现一个没有民众的空间。这能让人想象吗?允许人这样想象吗?没有德国人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了德国人的世界会有怎样的新开始?世界从此得靠中国人拯救?没有了德国人,其他民族感觉像缺盐?没有了我们德国人,世界还有什么意义、什么情趣吗?难道世界不用再造出包括萨克森人、施瓦本人在内的新德国人了?回首历史,德国人的死绝会不会被认为理所应当?——因为他们只在博物馆玻璃窗内陈列着,世界终于可以安宁下来不再受其野蛮干扰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德国人如果放弃人口增长,让自己从历史上消失,让自己变成世界新成员的教材,这是不是一种高尚姿态?

这些假设萦绕脑际,挥之不去,说明它们已成了我的专题。不知道的是:它们该写成一本书,还是该拍成电影?这本书或电影可以叫《大脑产儿:德国人会死绝?》,或者两者都可这么叫。这个名字来自有关宙斯神的传说。宙斯神的女儿——女神雅典娜就是从

宙斯脑袋里诞生的。这个想象实在荒谬：当今世界，男人的脑袋还能怀孕。

旅行时，行李箱里装着我的报告草稿，那是一份十四页的英文稿，讲的完全是另外的问题，题目为：“两种德国文学”——或者，也可用它的副标题为题目：“德国——一个文学上的概念”。这是我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做的报告。我想阐述的观点是，现在生活在两个德国的德国人，只能在文学上找到共同的德国东西。文学没有边界，即便这个边界会被人为设定。德国人不想让文学没有边界，或者他们不允许这样。因为这两个国家不论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大相径庭。因而与其说他们在携手生活，不如说他们在分庭对抗。如此说来，他们很难轻松地将自己认同为一个民族，认同为一个民族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一方面只想充分发展物质领域^①，另一方面又要在理论上给出各自定义，这就消除了他们做一个文化民族的可能。除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他们似乎就想不出什么别的了，只有物价还是他们都愿意作比较的。

然而，这些年出现了人口增长缓慢的问题，亲爱的原油流速也不够理想了，于是人们寻求起精神内涵来：要让它来填充物质上的空缺。人们要找精神食粮，找那些被称作价值观的东西，用以摒弃思想上的吹毛求疵。伦理观开始降价促销。市场上每天都有新

① 这里的物质领域译自德文 *materialistisch*，它在西德指消费领域，在东德指唯物主义领域。

基督概念出现。文化正在其中。各种展览、读书会以及讲座多如牛毛。戏剧周没有尽头。音乐人们也听够了。市民们抢起书籍来如同去抓救命草。这个德国或那个德国的作家都过于出名，其知名度在这个德国超出了警察的许可，在那个德国超出了民意测验中公众的期望值，这让作家们惶恐不安。

我只想用简单的语言或简化了的语言向听众介绍一下二战后德国语言文学的断续发展，我想介绍这种文学不够灵巧的直率性及其形式简约的困窘。在北京，面对（九亿五千万中的）两百位中国人我这样说：“1945年，德国不只在军事上被战胜了。遭到破坏的也不只是众多的城市和工业设施。更大的损失还在于，国家社会主义^①的理论基础从根本意义上搞乱混淆了德语，腐蚀败坏了德语，使德语受到大面积创伤。这样，战后作家不得不使用遭到了破坏的语言，不得不拖上所有语言创伤写作。这种情形下，他们更多的是在打磕巴，而不是在写作。与流亡在外的伟大德国作家，如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相比，他们在写作上的束手无策比比皆是、显而易见。相形于经典文学的宏大，战后作家在组织语言上几乎只能结结巴巴。”

这时在座的一位中国人——有限的被允许前来者之一，说：“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被‘四人帮’破坏了十年（他指的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大脑迟钝了。‘四人帮’也把语言扭曲了。有些作家现在才开始小心地讲起过去发生

^① 简称纳粹。

的事情，如您所说，磕磕巴巴地讲。他们也开始写从前禁写的东西，比如爱情，当然不是肉体上的。关于肉体我们的限制还比较严格。您知道，我们不许早婚。当然这里的原因是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太多，不是吗？而且结婚后才能得到节育用品。到现在为止，年轻人的这种困境还没有人写。年轻人没有自己的地方。他们也不允许拥有。”

这是位身着蓝衣的青年，大概三十出头。他的德语是他“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过教科书学到的。在那个极端的环境下，他必须给书做些伪装，将它包裹上带有其他画面的封皮。“四人帮”垮台后，他去海德堡学了一年当代联邦德国的通用德语。“我们，”他说，“我们这代人的确是变痴变傻的一代。”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教师，还希望继续进修，他说：“我们学的东西很多，每星期三十八节课……”

我的这对大脑产儿是一对教师夫妇，他们是伊策霍（Itzehoe）人。伊策霍是德国北部荷尔斯泰因地区的一座小城^①。这里的土壤状况介于水洼与海岸沙质地之间，是个人口下降、建筑整修方面的亏损不断增长的地区。他三十五六岁，她三十出头。他出生在哈德洼（Hademarschen），他母亲现在还住在那儿。她则在凯坡洼（Kremper Marsch）出生。她父母卖掉原住房后，带着他们的养老财产搬到了凯坡城。夫妇俩都属于不断反思自己的学生运动元老。他们是在基尔相识的，在一次集会上。那是一次反越南战争，

① 人口约为三万两千四百名。

或者反对施普林格出版社^①的集会，或者是两者都反对的静坐集会。我先暂时说在基尔，实际上也有可能是在汉堡、在柏林。十年前他们要“砸烂许多将他们毁了的观念”，而且当然要用暴力。但他们的文化革命很快终结了，以致他们延长的大学学业也得终结——其原因几乎不值一提。于是他们也就在短暂摇摆——在各自的合租公寓里换了一个又一个伴侣——之后，缔结了百年之好：当然不在教堂结婚，只在家人陪伴下举行了婚礼。

这是七年前的事了。自四五年前起，他们都成了服务于国家事业的公务员。先做了实习教师、预备教师，然后都成了正式的文理中学教员。他爱她，如同她爱他。这是一对模范夫妇，像其他模范夫妇一样，水乳交融，和美相依。他们还养了一只猫，不过没有孩子。

没孩子的原因不是他们不能生育，生不成孩子，而是因为在她“终于想要”孩子的时候，他总说“先别”。等他想要孩子了，她又说“我不想要”；或者说，“不再想要了。考虑问题得实际，得负责任。我们能给孩子什么未来？未来里什么希望都看不到。再说，在印度、墨西哥、埃及、中国，孩子已经够多的了。你自己看看统计数据吧”。

这对夫妇都教外语，他教英语，她教法语，都是卡尔大帝中学——简称 KKS——的老师。他们教的第二科目都是地理。这

^① Springer 出版社是德国较大的出版社之一，他们出版的《世界报》和《图片报》，当时都反对学生运动，让大学生深恶痛绝。

所中学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九世纪时卡尔大帝曾派远征军讨伐荷尔斯泰因。远征军在那儿建起围墙,就是现今伊策霍的由来。又因为他们都喜欢教地理,这样他们除了了解山川河流、土质地矿知识外,也会了解到人口问题。他乐于谈论马克思有关通过生产剩余价值达到资本积累的理论,她则喜欢引用数据、曲线和预测资料:“你看,这是南美洲的人口增长率,南美洲有很多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达到了3%,墨西哥都5%。那点经济发展都让人口增长抵消了。可是那个可恶主教,还在禁止使用避孕药。”

她定时服用避孕药。而且总在第一堂课上课前。她那是要向众人展示她的理智放弃,展示的方式却稀奇古怪。电影《大脑产儿》可以这样开头:一张印度次大陆的地图前,出现了她的上半身,她的身子几乎遮住了整个孟加拉国、孟加拉海湾和整个加尔各答。她服避孕药后,将手上的书合上,(没戴眼镜)说:“印度联邦共和国推行控制人口政策,也打算实施计划生育,但是我们推测,他们没能实现。”

现在她可以在班上提问:印度比哈尔邦、喀拉拉邦、北方邦的人口状况如何,超出计划的人口是多少。班上学生不必入画面。课堂上讲述的是贫困,是未来。

我对沃尔克·施隆多夫^①说:“如果我们拍电影,我们应该在印度拍,或者在爪哇,或者在我们刚去过的中国拍,如果我们能得

① 将格拉斯小说《铁皮鼓》改编成电影的德国电影导演。

到拍片许可的话。”施隆多夫正和他太太玛格丽特·封·特罗塔^①在一起。我们在旅行路上碰上了他们，先在雅加达，后来在开罗。

我们这对教师夫妇也应该去亚洲旅游，就像我和乌特·沃尔克和玛格丽特一样，要去遥远的地方做陌生人，要在现实与统计数字间汗颜。他们会经历从伊策霍到孟买的飞跨，会经历时差；他们手提包里也有读物，脑袋里也有既定观念，接种了疫苗，还怀有新的狂妄：我们要来学习……

在孟买人头攒动的街头，他们首先感到的会是害怕，如同我们在上海街头出现的情形。他俩大脑中也会出现某种设想：将七亿印度人想象成七亿德国人。不过印度人的这个中不溜秋的值不适合我们。按照我们德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个数值不够极端。如果我们不死绝，那就该变成十亿。不这样，则那样。

我们和施隆多夫夫妇的文化旅游都由“歌德学院”一手操办。活动排得很满，他们介绍他们的电影，我介绍我的书。我们的这对教师夫妇则应该利用假期搜集资料，因而他们特意找到一家专门提供原生态旅游的旅游公司。歌德学院的活动安排我是了解的，可这对教师夫妇的旅游计划（以及他们的“艰苦”行程）我还得构思一番。我们的旅游由歌德学院组织，而教师夫妇则由一位导游陪同。这位导游会告诉他们，哪儿可以买到象头神，哪儿可以买到爪哇木偶；还能告诉他们，如果印度人侧着脑袋摇头，意思是同意；告诉他们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告诉他们坐人力车时需付多

^① 当代德国女导演。

少小费；告诉他们，是否可以付钱请当地人领他们参观一两个贫民区；告诉他们是否可以在那里照相。

对歌德学院的女团长和她的私人困境我就不提了。而教师夫妇找到的旅行社导游，我们的电影里还得拍他，他应在大学学过印度学。我们得说：他应有一张老相的婴儿脸，水汪汪的眼睛总是一目了然，脸上总带有某种神的神态，戴着一副镍边眼镜。对任何事物他都能看到两个方面。

我们也同样。一方面我们知道修建核电站的风险无法估计，另一方面，我们习以为常的富足生活必须靠新型高科技来保障。田间耕作一方面可为八亿中国农民提供工作和食粮，另一方面，农田收入又只能依靠农业科技来提高。可是这个农业科技，又会在一方面以及另一方面使一半以上的农民失去工作，或者让他们改行，至于他们以后该做什么又是无人知晓。在曼谷、孟买、马尼拉和开罗，那里的贫民区一方面应该改建翻新，另一方面改建后的贫民区又会吸引更多人离开农村。总会有这一方面，那一方面。

我们这对伊策霍的教师夫妇，很了解中欧社会的这些“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政治上，也接受了这种思维习惯。布罗克多夫^①就在伊策霍附近。她是自民党成员，他则热心组织周边地区社民党成员开办有关“第三世界”的报告会。夫妇俩都认为：“绿党的理论一方面有说服力，可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引起

^① 这是一个有人口一千名的小镇。这里从1976年开始修建核电站，遭到强烈抵抗后停止修建。1980年年底重新开始施工。1986年10月8日核电站正式运行。

权力之争。”

这些争论以及更多的问题都会让大脑不得消停。他看不到前景，她得不出生活的普遍意义。她的情绪说变就变，他则一到下午就精疲力竭。她指责她父亲“将家园变卖给了鸡蛋场”。他母亲一人在哈德洼过日子，他本想把她接入他们的教师之家，可实际上他又在找管理优良的老人院，因为他要“理智处理”这个问题。她，理论上原本很想要一个孩子，但自从地理课上的印度次大陆成了她的心病，她从此就自觉放弃了做母亲的可能。对他来说，学校里的孩子已经让他够受的了，到了周末他更见不得孩子，可最近他又说：“咱们这套老式单元房，加上花园，住三个人肯定没问题，就算是母亲搬来居住。”

这些思虑让他们很不轻松。孩子总是一个问题。不论他们在伊策霍“荷尔斯泰因购物中心”采购，还是在布罗克多夫附近的易北河岸边参加反核电站的抗议活动；不论在考虑买双人床垫，还是在买二手车时，孩子问题都会浮现出来。眼睛总要瞄向小孩用品，暗暗希望排卵那刻会受孕，购车时会查看车门有没有防范小孩手动的保险机制。交谈中说的都是如果这样，如果那样，比如如果哈姆的母亲——他母亲（作为孩子替身）搬来会怎样，将她送到老人院又会如何。直到一天上午出现了一次震动，这样的寻常交谈才戛然而止。

那天她——朵特·彼得斯在九年级 A 班上地理课。她介绍计划生育，介绍为了防止人口过度增长可以采取的避孕途径，比如用药或自愿接受结扎节育手术。这时一位女学生（同朵特·彼得

斯一样一头金发)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那我们这儿呢?人口不增长了。德国人越来越少了。您为什么不要孩子?为什么?在印度、墨西哥、中国,人口一个劲儿疯长。我们这儿呢?德国人要死绝了!”

我和施隆多夫导演还不知道这个班的学生对此会做什么反应。女学生的这种宣泄会不会同她的家庭教育有关?也许站起来的是男生会更好些?这个男生会对外籍工人说风凉话:“以后在咱们伊策霍,生孩子的就只有土耳其人了?”或者最好让男生、女生一个接一个说类似情绪化的言论更好些?

不管怎样,(在全班担心地吃吃笑过之后)“德国人要死绝了”的说法更使一种莫名的担忧蔓延开来,文理中学的朵特·彼得斯老师也染上了这种担忧。这种担忧会同其他担忧混在一起,成为火箭驱动燃料,被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①用在大选上,也会被争相传诵。

“如果我们1980年拍片的话,”我对施隆多夫导演说,“还会有个问题。我们只能在七八月拍。因为之前之后都是大选。我不知道你打算做什么。不过我不想对大选袖手旁观。肯定会有很多人想看国家没落的小笑话。”

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没有人问到两个德国的统一问题,其实对这个问题中国本可以给出一些影响。我也不知道,我要论述的“两个德国一个文化民族”的观点能否让中国大学生和他

^① 1915—1988,拜恩州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的重要政治家。

们的老师感兴趣,这种兴趣在我们这儿是遇不到的。我说:“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东部西部的邻国,不会再允许在曾经燃起战火的欧洲中部,再出现一个经济军事上的强权。不过,在一个共同文化的屋脊下,两个德国的存在还是更能让邻国接受理解,而且这也符合德国人的民族共识。”

这只是一个幻想吗? 只是一个文学梦吗? 在北京、上海以及后来的其他地方,我在报告中不断陈述这些观点,活像一个四处游说的痴傻布道士。与那些搞分裂的君主们相对照,德国作家好像想将爱国者的形象塑造得更像样些——这是不是太偏执? 我从洛高^①、莱辛讲到伯尔、比尔曼^②,天真地想象我的听众对德国文化及其发展都很了解(我的这种单纯可能很感人)。(即便我的教师夫妇哈姆和朵特也会对此摆手,觉得难以承受。哈姆说:“嘿,这种报告只会出现在电视三台里。”)

到家了,回来了。结束亚洲之行后,日常生活随即换了内容:中国领导人来访,到处是对德国人会死绝的担忧,巴罗^③被东德驱逐到西德,每晚都有对柬埔寨大屠杀的报道,法兰克福书展余震不绝。二战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只要这两个德国还在分庭抗争,许多人的纳粹历史——当然是隐藏着的——就会被迫从档案夹中一次次地取出。这些人包括阿登纳国务秘书戈罗布克、联邦总理格奥尔格·基辛格、联邦州总理菲尔宾格、现任联邦总统卡斯滕斯。

① Logau, 1605—1655,德国巴洛克时代诗人。

② Biermann, 德国当代诗人。

③ Bahro, 1935—1997,东德异议人士。

接着《时代周报》出现了一篇题为“即便一切都已砸烂，我们还要继续文学创作”的文章，文章不同意将 1945 年作为德国战后文学的零点，而要将纳粹时期定作德国战后文学的开始。

这篇文章引起了大争论，而且余波不断。文章认为战后文学及文学家的纯洁问题不存在争议，尤其是那些第三帝国期间没有离开德国、且在纳粹为他们圈定的“自由空间”发表了作品的作家。由于文章中许多半明半暗的地方，暗示了某些作家与纳粹有较近的关系，致使文章中原来的主题成了次要话题。这篇招致争议的文章的作者成了众矢之的。

他成了泄密者，应该像对待敌人一样被处决。谁让他去捅那个马蜂窝，而且还公开去捅？！他只有被送上刑场的份，于是他赶快转舵逃走。可是这能管多久？破了禁忌者总会受到相应习俗的惩处。

一旦德国人沉入对过去的回忆，他们又会置身于那些角色之中：罪犯与受害者，原告与被告，有罪者和后来出生的无罪者。他们会用固定的观念来看待一切，会认为自己有理，还要让别人认可他们的有理。他们盲目地——也是错误地——将德国的过去当成现在，将伤口再次掀开，让那些已被敷衍过去、渐渐远离的日子再次浮出。

我不将自己排除在外。亚洲旅行时，我大脑深处带着许多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同中国同行的一次茶话会上，我问一位中国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四人帮”效力十来年的人，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处置？人们以这个国度特有的可爱委婉的方式回答我说：在最惨烈的时期，文学是被禁止的；腥风血雨吹不开任何花朵；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位成了“四人帮”的宠儿，在一贫如洗的文艺舞